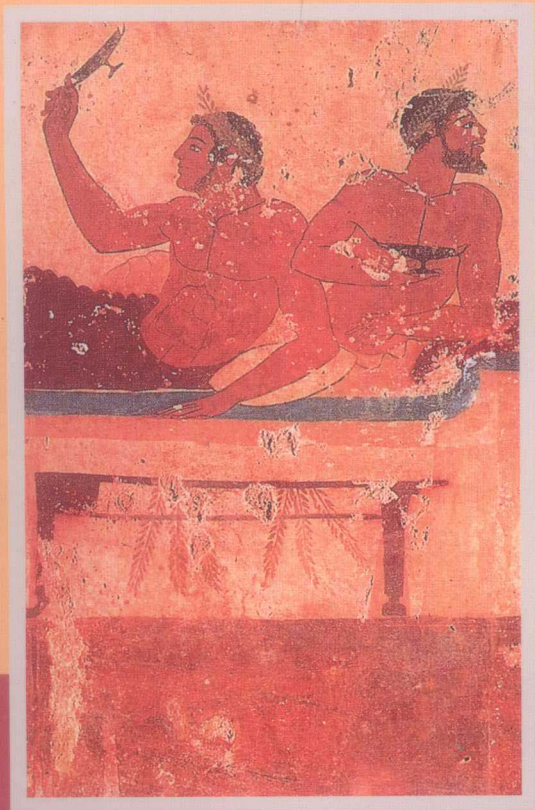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英] J·K·戴维斯 著

J·K·DAVIES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黄洋 宋可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希腊文明译丛

[英] J·K·戴维斯 著

J·K·DAVIES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黄 洋 宋可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英)戴维斯(Davies, J. K.)
著;黄洋,宋可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 希腊文明译丛)

书名原文: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ISBN 978-7-208-09208-2

I. ①民… II. ①戴…②黄…③宋… III. ①民主-
政治制度-研究-古希腊 IV. ①D7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6981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西学文库· 希腊文明译丛·

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英]J·K·戴维斯 著

黄洋 宋可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8 字数 268,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08-2/K·1667

定价 38.00 元

前 言

25年前,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写道:“所有古代史研究者心里都清楚,希腊史在经历一次危机。”这一评论至今仍未过时。其中一些困难是技术性的,如确定事件年代、复原现已破损的碑铭文本,或是整合不同地区发生的事件等。另一些和史料有关,例如摆脱政治军事史局限的挑战、排除文献资料的有闲阶级偏见的挑战,或是将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的挑战等。最为根本的问题是要确定,对于事件和社会结构如何进行阐释性理解才算是令人满意的。在本书中我试图阐明这些问题,直面这类挑战,同时又不忽略清楚地展现事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时候,正是事件可以被看成是“历史”。不过我却不能评判,我是否在两者之间很好地做到了平衡。

就实际问题而言,本书中的地图仅仅是为了指明正文中提到的地方和地区,上面标明的政治边界通常仅仅是大概的。至于援引史料时所用的缩写和惯例,见原始资料部分。译文有时是笔者自己的,有时引自“洛布古典丛书”(Loeb)、企鹅丛书(Penguin)或人人丛书(Everyman)版,有些有所修改,有些没有,另有引自伦敦古典学教师联合会的原始文献译丛(LACTOR)。笔者特此感谢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William Heinemann Ltd)、企鹅图书出版公司(Penguin Books Ltd)、邓特父子出版公司(J. M. Dent and Sons Ltd),以及伦敦古典学教师联合会允许使用其出版的译文。

笔者也感谢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给予帮助的许多个人和机构。写作本书的计划最初是1973年4月在哈特研究院(Foundation Hardt)形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1975年秋季学期学术休假时写成,因此我尤为感谢哈特研究院及其院长赫维丹(Reverdin)教授以及牛津大学欧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院长及诸位研究员。出版社及其编辑迈克·藤布尔(Michael Turnbull)、R·B·伍丁斯(Woodings)、科林·默里(Colin Murray)和海伦·弗雷泽(Helen Fraser)以极大宽容和鼓励忍受了我的拖延,而且接受了一部比他们要求的长很多的书稿。丛书总编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以及拉塞尔·梅格斯(Russell Meiggs)、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和马丁·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阅读了部分或全部初稿,其批评、建议和修正使本书免于许多大错和含糊不清。作为大忙人,他们贡献的时间、知识和帮助是最为慷慨的礼物。我主要受恩于我的父亲哈罗德·戴维斯(Harold Davies),他对其中八章细致而具有建设性的评论修正了许多地方的内容和表达,改变了强调和聚焦点,使得本书整体更具可读性而少了些矫揉造作。我向他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1977年12月于利物浦

第二版前言

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院的继承者、大学教师的原型特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os)在一封信中曾说道：“阅读自己的作品有助于修改。万事拖延和漠不关心是年轻一代不再能够忍受的”(D. L. v 37)。如果真像第欧根尼(Diogenes)所说,有多达 2 000 人聆听他讲学的话,那么他和我们面对的问题相差不大。同事和学生反馈的结果表明,本书适合的主要读者并非古典希腊的初学者,而是对政治和社会面貌更具反思和分析能力的入门者。因此我所做的两个修订意在帮助这些读者。首先,对原始资料、尤其是延伸阅读文献进行了大幅增加,以便读者注意到近来出版的大量英文论著,从而更好地帮助自学。其次,因为 1978 年以来对雅典的研究急剧增加,本书新增了专门讨论公元前 4 世纪雅典的一章(第十二章)。除了印刷错误的更正以及铭文引注的更新以外,其他章节基本未变。

1992 年 7 月于利物浦

目 录

前言	1
第二版前言	1
第一章 史料及其局限	1
第二章 公元前 478 年的希腊世界	9
第三章 区域性野心	37
第四章 雅典革命	52
第五章 雅典帝国	65
第六章 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社会	90
第七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	121
第八章 斯巴达霸权	140
第九章 社会变化	158
第十章 哲学家、雇佣兵和君王	181
第十一章 公元前 380 年后的雅典和忒拜	204
第十二章 公元前 4 世纪的雅典社会	220
第十三章 机会主义者	240
大事年表	265
原始资料	269
推荐阅读书目	275
地图	295
索引	300
译后记	326

第一章 史料及其局限

公元前 480 年之前的希腊历史虽然错综复杂、充满活力,但却大体上不受外界影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部地中海文明的蛮荒边界上徐徐展开。尽管出现了殖民运动,但在长久的希腊文化区域以外,希腊历史的影响在政治上仅只是间歇性的,在地理上也仅只是边缘性的。公元前 480 年之后,希腊历史进入了主流。公元前 478 年标志着波斯帝国在西部边界扩张的失败,公元前 336 年则标志着希腊人和半希腊人(quasi-Greeks)以武力接管波斯帝国的开始,因此本书起始和结束的年代并不仅仅是希腊的年代,而且还是、甚至主要是东部地中海的年代。在这期间,希腊物质、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长远潜力和局限都充分显现出来,希腊艺术和文学的杰作诞生于此期间,同时希腊诸邦及其居民处于最为强盛、最有抱负和最争吵不断的阶段。

这个时期也是全部希腊历史上记载最为充分的时期——当然是就广义上的“记载”而言。非语言的证据本身非常可观,不仅就遗址而言——包括圣地、神庙、城堡、公共建筑、房屋、墓葬以及城市和乡村居民点的整体模式,而且就手工艺品而言——包括雕塑、彩陶和普通陶器、武器和其他金属制品、钱币、家用物品、农具、工匠用具、珠宝,这些可见物质的数量和质量本身就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具有创造性的文明,其中至少部分个人和群体发展到了远远超越生存的地步,得以控制

2 一个广阔区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即使根本没有留下文字资料,我们仍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个主要的文化。更有甚者,现存文字记载使我们得以比较准确地勾勒出其政治与社会环境。这些文字资料可以分为六类。对于具体作家的著述以及系列文献,后文将进行更为详细评述,但也有必要先概述每一类资料包括哪些,并注意到文献资料的一些局限性。第一类资料是铭文。几乎所有铭文都是刻于石头之上,仅有少数刻于青铜和铅版之上。约公元前 460 年之前少有铭文,但之后大量增加(尤其在雅典),汇集成了成百上千重要程度不等的铭文,其内容从条约、国家法令、政府管理委员会的陈述到公共或者私人场合的人员名单、祭献给神明的物品记录、墓碑和魔法咒文。本书将大量引用铭文,部分是因为读者不易得到其译文,而且新铭文或者新残片不断出现,但主要是因为铭文的形式和用语比其他史料都更为清晰地揭示出希腊公共生活是如何开展的,以及当时的人们认为什么是值得记录的重要事情。

第二类是历史记叙(和几乎所有文献资料一样,在洛布古典丛书、人人丛书、企鹅丛书或他处都有不同英译本)。这些要么完整保留下来,要么部分保留下来,向我们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梗概,时而不厌其烦的详细,时而又惜墨如金的简略。其中最为详细的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非常完整地记载了公元前 430 年代末期之后的历史,至公元前 411 年末戛然而止。色诺芬存世的《希腊史》(*Hellenika*)接着他的记叙续写,直至公元前 362 年的曼提涅亚(Mantinea)之战。希罗多德的记载至公元前 479 年末结束,对此后直至公元前 430 年代后期的历史,我们主要依靠修昔底德记载中的一段简要插叙,但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整个时期,我们还有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在公元前 40 年代和前 30 年代根据更早史料编写的简要记载。具体而言,其《历史文库》(*Historical Library*)的 11—20 卷记载了公元前 479 年至公元前 302 年的历史。由于他关于公元前 479—前 431 年希腊本土的记载出自修昔底德,因此这部分价值不大,但是关于公元前

411 年之后的历史,他利用的史料除了残篇之外业已散失。今天我们能够确定他所使用的大部分史料是当时公认的最好记载,不过他的概述并不总是很好。 3

这些历史学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历史不自在地徘徊于修辞和道德哲学之间。正如史家对于特定行动是否有违道德都有着强烈的看法,同样,在记载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们都让主要人物发表精心构思的演说,这有可能是真实发表过的演说,也有可能不是。其次,他们主要都集中于记载政治与军事事件,而将希罗多德从公元前 6 世纪爱奥尼亚(Ionia)地理学家那里继承的种族和文化兴趣扔到了一边。再次,他们侧重记叙希腊的一般事务,使地方史和古代史成为了另一类史书(对此我们仅从残篇中得知),因而不可避免地集中于列强的相互关系。最后,他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同时记叙在多个中心或者战场展开的事件,并且发明了不同的方法,如严格按照先后顺序记载(例见修昔底德),或是把同一区域的事件放在一起记叙,直至一个自然的间断(例如色诺芬对于公元前 403 年之后的记载以及狄奥多鲁斯所援引的一些史书)。因此,事件的确切纪年就成了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通用纪年体系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由于各个城邦的历法和新年开端各不相同,修昔底德不得不记载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始于(公历为公元前 431 年)“‘三十年和约’的第 15 年,克里西斯(Chrysis)在阿尔哥斯担任祭司的第 48 年,埃内西阿斯(Ainesias)担任斯巴达监察官之时,毕托多洛斯(Pythodoros)担任雅典执政官(archon)尚余两个月之时,在波提提亚(Potidaea)之战 6 个月之后的早春”(2. 2. 1)。诚然,在埃利斯(Elis)的希比阿斯(Hippias)确定了公元前 776 年开始奥林匹亚赛会短跑(stadion, 距离为 200 米)冠军名单之后,情况有所好转。因此狄奥多鲁斯如此确定公元前 380—前 379 年:“在前一年结束之后,毕特阿斯(Pytheas)担任雅典的执政官。这年罗马没有选举执政官(consuls),而是选举了 6 名保民官。……埃利斯人庆祝了第 100 届奥林匹亚节,他林敦(Tarentum)的狄奥尼索多洛斯(Dionysodoros)赢

得了短跑冠军。”(15. 23. 1)但这仍然是个十分粗略的纪年体系,尤其是(像狄奥多鲁斯那样)粗心使用,把分别始于1月、3月、7月和12月的年份等同起来的时候。因此我们常常不能肯定,一个特定事件发生在两三年中的哪一年,有时甚至不能确定一件逸事或者文件应该属于哪个十年期间。

第三类史料是雅典的演说词和短篇政论。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容易划定,因为演说词之所以幸存下来,纯粹是归功于作者的保存,他们有时亦撰写演说词,作为宣言予以发表。第一个如此做的人是活跃于公元前420年代的雅典人安提丰(Antiphon),他撰写虚构场合下的演说词,作为辩论的样本。共约有145篇演说词以及演说词风格的政论幸存了下来,分布于公元前420年代至前320年代的一个世纪里。幸运的是,它们出自许多不同作家之手,从伟大的演说家兼文体家如吕西阿斯(Lysias)和德谟斯梯尼,到小政治人物如安多基德斯(Andocides)和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os),还有塞进这个和那个作家“文集”中、但肯定不是出自他们之手的演说词和政论。这些无名作品中最具价值的是一篇公元前420年代的政论,在传统上错误地归于色诺芬,它从如此充满敌意和反动的角度描述当时的雅典社会,以至于其作者通常被称为“老寡头”(Old Oligarch,本文即沿用此名)。除了这类政论之外,还有许多撰写的演说词是用于在法庭的公民陪审团面前、或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的。公民大会演说词自然涉及公共政策,而法庭演说词的诉讼如果和政治人物的政治活动相关(这类诉讼至少在雅典变得十分频繁),亦会涉及公共政策。其他法庭演说关乎继承权争议、公民权争议等,因此提供了许多关于私法的信息。

第四类史料是人物传记。这一类型似乎发端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赞扬或批评著名人物的政论。现存最早的这类传记出自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Isokrates)之手,完全是圣人颂一类的。后世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家从早期历史著作中辑录了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的逸事,其中普卢塔克的贡献尤为突出,其写作年代为约公元70—120年。他阅读过大量

我们无法读到的资料,借用其斯多葛主义道德哲学家的训练和性情,以令人羡慕(尽管有时是不加鉴别的)记忆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以其《传记》⁵创造出的一系列人物素描是历史重构和敏锐心理把握的精彩短文。

至此我们所提及的所有史料均以散文体写成,但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忽视公元前5世纪的诗歌。抒情诗作为主要的艺术形式,未能延续到公元前450年之后。但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品达和巴库里得斯(Bacchylides)幸存的合唱颂诗,其语境和内容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上层阶级价值和思想的大量信息。同样,尽管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悲剧家几乎总是表现年代久远的神话主题,但他们以自己时代的语言和价值、说理方式、关切的事物、有时甚至是政治取向来探讨这些神话。因此,他们对于神话的重新解读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喜剧和公元前5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喜剧”残篇更是如此。大约公元前450年之后大量出现的这类戏剧是滑稽比赛、仪式性猥亵、神话式诙谐模仿、动物装扮、逃避现实的幻想以及抒情诗歌的奇怪结合,而且还掺杂着政治讽刺、对人物的滑稽模仿和评价。遗憾的是,公元前388年后直至米南德(Menander)为止的喜剧并未保存下来,后者的喜剧作于公元前320年代及以后,因此而不在于本书所讨论的时间范围之内。然而还应该说明,尽管“旧喜剧”的疯狂幻想销声匿迹了,米南德的喜剧亦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但是其主题和关切的事情——尤其是地位、公民权、足够舒适生活的财富以及浪漫爱情所施加的紧张关系,都以近乎现实主义的形式,更清晰地揭示了当时人们渴望实现的梦想。

最后一类史料是哲学著作以及同类作品,它们是最为杂乱的一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存的著作之外,还有出自其他许多作家之手、明显为学术或者科学研究的专著。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许多领域的行为模式,这些领域包括地方史、演说术、政体、军事技术、家庭及其田庄管理、医学、植物学和矿物学。对于历史学家(在此处充当科学社会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需要解释为何出现这类知识活动,以及何时出现,但眼下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它们提供了大量有用⁶

的信息。

然而现有史料的质量、数量和直观性具有危险的诱惑性。首先,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论著保存了下来。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和科学论著几乎完全失传了。许多重要历史学家如埃弗罗斯(Ephoros)和提迈俄斯(Timaios)以及地方史家和古物学家的著作都已散失,仅有一些片断得以保留,或是因为狄奥多鲁斯的援引得以部分保留。由亚里士多德编撰或是他支持编撰的158部《希腊城邦政制》,仅有一部——即《雅典政制》——大部分保存下来,发现于1891年发表的一份纸草文献之中。大体保存完好的演说词和演说词风格的政论有约145篇,而从保存下来的篇目和残篇中我们所知的至少有440篇。即是说,现存的文献在当时的文献中可能不是最好的、或者是最为典型的。例如在1908年和1949年,发表了一些纸草残篇,它们出自一位迄今为止身份不明、亦无法辨明身份的历史学家之手,是修昔底德著作一流的续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记叙是狄奥多鲁斯对公元前411年之后的叙述的基础,我们亦可试探性地给他命名。然而假如本书写于1908年之前,我们就根本不会知道此人的存在,更不用说其著作的品质了。其次,现有关于这两个世纪的史料绝大部分都集中于雅典。普卢塔克现存的人物传记有14篇是关于这一时期的,其中就有8篇是雅典人物的传记。在幸存的演说词中,除2篇以外,全都是用于在雅典发表的。现存的悲剧和喜剧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出自雅典,大部分哲学著作和专论亦是如此。现存属于公元前478—前336年间的雅典法令近二百条,还有几百件其他行政文件,但出自其他地方的铭文资料极少(主要来自重要圣地如奥林匹亚和德尔斐)。仅有两件铭文从斯巴达方面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许多地区如西西里、南部意大利、帖撒利、科林斯完全没有留下铭文。再次,即使撇开对雅典的过于关注不谈,还有其他更为微妙的偏见。只有把史料提供的信息和我们能够推测的希腊社会一般的活动和关切点加以比较,这种偏见才能显现出来。一个特定的例子是,建筑工程账目[如雅典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和埃瑞克特昂(Erechtheion)神

7

庙的账目,厄皮道鲁斯(Epidaurus)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圣地的账目,公元前370年后德尔斐神庙的账目]提供了许多关于公共资助的主要神庙建筑的信息,但却丝毫没有提供关于私人资助的公共建筑、小型或者私人宗教崇拜建筑、私宅的信息,以及关于新居民点如图里(Thurii)或是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抑或是庇里埃夫斯(Piraeus)港、奥林托斯(Olynthus)以及米利都(Miletus)的新街区的规划和建筑信息。又如,我们拥有关于宗教崇拜和节日的文件,例如祭献铭文、祭祀历法或是和宗教崇拜相关的体育或音乐竞技中获胜者的名单。然而,这类文件不可避免地反映正式的公共行为,正如宗教诗歌和神话书写反映了对于传统仪式之起源的创造性的但却是理性的追寻,由此而反映了对其进行解释和论证的追求,而希腊宗教迷醉的、展示的,或是巫术感应的一面则很少得到反映。最为根本的是,有关象征人生主要危机(如出生、青春期、婚姻、生育、丧亲和死亡)的情况,以及帮助度过这些危机的情况,则更少得到反映。更一般地说,我们了解战争、政治和诉讼的一些细节,但极少了解日常生活的细节,无论是在田间和果园、在山涧牧场、在工匠作坊,还是在矿山、在海船上、在家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妇女和奴隶在文献中都很少出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被引导到上层或者有闲阶级的活动和优先关注点中来。最后,也许是最为重要的,荷马史诗传统中的陈式化表述仍在产生影响。一份“文献”(document)是按照相对有限的明确体裁形成的,其存在和流传依赖于作者及其社会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亦依赖于什么形式对于表达具有影响。没有“私人文书”流传下来。如果我们抛开那些要么是政治性、要么是后来伪造的信件,就只有两封属于公元前320年代以前的私人书信保留下来。几乎没有像在庞培发现的那类令人饶有兴味的涂鸦。即使是刻有雅典政治家名字、用于陶片放逐法投票的陶片,也大多简短且刻意回避了在我们看来通常是粗俗的话语。因此出自雅典的一块诅咒刻板表面上看起来是私人的宣泄:“(我诅咒)打着烙印的奴隶织网工基托斯(Kittos)及其手工和作坊,织网工欧弗

8

罗苏内(Euphrosyne)及其手工和作坊,美利特(Melite)的菲洛米洛斯(Philomelos)和菲勒亚斯(Phileas)以及欧格通(Eugeiton)之子、阿卡奈村社(Acharnai)的欧格通。”(E. Ziebarth, *SBAkad. Berlin* 1934, 1032 No. 5)然而它其实是非常陈式化的表述,同类的咒语揭示了这一点。诚然,新的体裁和形式不断涌现并确立下来,但在所有的文献中,我们都将不得不面对精心构思的正规表述难以捉摸的真实含义。

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史料不如看起来那么直截了当。当然,我们必须从史料出发,紧扣它和它以自身方式所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试图补足其空缺并跳出其偏见。最好的方法是寻找解释性主题和模式,以及尽可能直接重建希腊历史和社会的总体面貌。幸运的是,一个有益的事实将会出现。即便对于寡头政体或者君主政体来说,也不能草率地认为政治和权力是自主的领域,局限于一个明确界定的较小精英群体之内。相反,无论是何种政体,在“政治”领域和生活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土地所有权)、总体社会价值以及艺术表达的内容之间都倾向于相互渗透。无论是多么间接地,我们的史料还是反映了这些关系。因此,本书尽管不可避免地偏重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较为忽略形象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我们讨论的还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它在多大程度上走向政治统一将是本书自始至终所关注的,分析在公元前478年的情形下哪些因素有利于统一、哪些又妨碍统一,是一个不错的入手点。

第二章 公元前 478 年的希腊世界

当我们谈论到公元前 478 年的“希腊”时，我们所说的既大于也小⁹于现在的希腊。它包括现在利比亚的大部分，塞浦路斯的绝大部分，从 Rhodes 岛到赫勒斯滂海峡、覆盖土耳其西海岸的一块近乎连绵不断的狭长地带，黑海周围散落的定居点，加里波利半岛 (Gallipoli)，沿爱琴海北岸的一块狭长地带，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向北一直延伸至阿尔巴尼亚的散落定居点，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以及西西里的绝大部分。相反，现在希腊的一些地方，在以前或者并不属于希腊（如色雷斯），或者通常不被看作是希腊的一部分（如马其顿）（见地图 1）。从历史学家和后来的古物学家那里，从发现的希腊文铭文，以及从那些可明确认定为希腊风格的神庙、住所和公共建筑的考古证据，我们有充分的把握来勾勒这个古代希腊世界的地理轮廓。然而，要界定是什么使得希腊世界具有希腊性则没有这么容易。其中一个方法是承认我们是从外部进行观察，识别出一些他们不同于我们的方式，即使我们继承了他们的一些概念诸如“政治”和“民主”、“伦理”、“修辞”、“逻辑”或者“几何”，即使许多公共及私人生活模式（成文法、铸币、协商式决策）在表面上或者在根源上和我们的如此相似。有些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多神论为基础并与土地丰饶和季节变化密切相关的宗教习惯，普遍存在的奴隶制，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称为动产奴隶制 (chattel slavery) 或者农奴制

(serfdom);只有少数人完全具备读写能力,但是直至自由人下层可能都有一定的读写能力;政治实体很小,以至于现在的卢森堡在那时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较大的城邦了。

- 10 以上这些区别的意味很清楚。尽管其他一些区别也可以揭示希腊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之间的鸿沟,但是需要更为细致的处理。在此举两个例子。第一,通过与其他前工业社会的类比,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远远多于半数甚至可能达到90%的成年人口(奴隶和自由人,男人和女人)从事农业生产。因此社会首先是农民家庭的集合体。在手工业者和政治精英加入之后,社会可能发展为城镇。当时存在一种趋势,人们向曾经有迈锡尼时代城堡的地方[例如忒拜、雅典或者俄尔科美诺斯(Orchomenus)],或者向那些在紧急情况下可供暂居的卫城所在地迁移。然而,似乎只有到了公元前6世纪,城镇才发展得足够大,从而对诸如城墙、排水管道和喷泉这些城市设施产生明确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在很多地方,直到公元前478年才开始出现城市化。因此,由于许多崇拜场所——像德尔斐和多铎那(Dodona)这样主要的神谕——在城市化加快步伐之前已经变得很重要,于是很多圣地和神庙,像阿尔哥斯城外的赫拉神庙或者阿卡地亚(Arcadia)地区巴赛(Bassae)的阿波罗神庙,仍旧伫立在旷野之中。也由此神庙和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有时显得紧张而复杂。

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基本上没有矿物燃料。事实上,铁和铜是有的,可以用来制造兵器、犁铧及其他一些器具。但是,它们是以木炭冶炼的,并且远远不足以用来制作绝大多数的家用或者农用器具,而这些器具通常使用木材、芦苇和陶土作为原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其他织物已损坏的情况下,各式各样形状和尺寸、各有特定用途的陶制容器,在任何一个博物馆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木炭和木材仍然是用于烹饪的燃料,甚至这些也可能变得稀少。我们知道当时有侵蚀和森林砍伐等环境问题;雅典人造船的木料得从色雷斯或者马其顿进口;甚至在雅典人迁居时,房屋的结构木料都要一起拆除搬移。海路运输依靠风帆或